

修齐治平: 北朝君臣的经典征引与儒家文化认同进程

段锐超

(陕西理工大学 图书馆,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 儒家文化认同是北朝文化认同的核心。北朝君臣学习、接纳儒家文化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修养,将“圣人之言”作为理论指南,用以指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在诏书、上表或朝议之中援引或化用儒家典籍语句或思想是其集中表现。虽然其间的历程艰难曲折,但这种经典征引的从零星到普遍化、习惯化的趋势,表明儒家思想作为北朝核心统治思想的地位逐渐确立,文化认同趋于完成。

[关键词] 北朝;儒家文化认同;儒家经典征引;修齐治平

[中图分类号] B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4-0021-07

以北朝君臣对儒家经典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语句或思想的征引为观察视角,可厘清儒家经典在北朝时期的接受过程及其地位的变动轨迹,揭示儒家思想发挥作用的形态样貌及其作用形式,并可以之观察北朝的儒家文化认同进程。

关于北朝君臣对儒家经典征引的研究成果较少。闫春新、庄亦乐《魏晋南北朝政坛中的〈论语〉征引》^[1]就魏晋南北朝各朝代君臣对《论语》的征引进行了初步研究。张金龙先生《儒家经典:北魏孝文帝思想的理论源泉》通过考察部分诏书或论政言辞,指出孝文帝的思想来源或出发点即为儒家经典,孝文帝的改革思想和新政是儒家经典、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的有机结合。^[2]

鉴于此,本文试从北朝君臣在修、齐、治、平四个方面的经典征引的有无与多寡入手,考察其与儒家文化认同进程的关系,并对其进程略作回顾与分析。对儒家经典的征引分为直引与意引两种,因学力所限,本文主要以直引为例来说明,其中又以皇帝及鲜卑贵族的引用为主。

一、北朝君臣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个方面的经典征引

经典征引是儒家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北朝君臣学习、接纳儒家文化,将其作为理论指南,

以“圣人之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志,并用其指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本质上就是对儒家思想文化体系及其实质的认同。皇帝本人以及鲜卑族大臣的征引更具有标志性,最能说明问题。

出于建立和维持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的需要,北魏初定中原,道武帝即执行“为国之道,文武兼任”的方针,为继任者依照儒家思想治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此后的实践中,北朝君臣从儒家典籍中吸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养分,内化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与言行准则,在诏书、朝议、上表、文章、言论中,援引或化用《诗经》、《尚书》、三《礼》、《周易》、《春秋》(及三传)、《论语》、《孟子》、《孝经》、《孔子家语》等儒家经典的语句和思想,将儒家理论自觉地运用到修齐治平的实践之中。

下面对北朝君臣在儒家所讲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方面的经典征引分别论述。

(一)修身

《礼记·大学》有言:“自天下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3]1952“修身”,即通过对自身文化修养的不断提升,达到仁圣的境界,这是儒家思想的基础,也是实现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前提。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北朝君臣律己修身以及大臣劝导皇帝修身砺行的座右铭和依据。如高允引《诗》为诫,劝导北魏文成帝行事不可不慎,要像周

[收稿日期] 2016-12-25

[作者简介] 段锐超(1970—),男,山西临汾人,历史学博士,馆员,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历史文献学。

文王一样由近及远,在婚娶丧葬诸方面遵行前朝改革之旨,为民表率。

允以高宗纂承平之业,而风俗仍旧,婚娶丧葬,不依古式,允乃谏曰:

……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于寡妻,及于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为政者先自近始。《诗》云:“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举动,不可不慎。^{[4]1073~1074}

“尔之教矣,民胥效矣”系引《诗经·小雅·角弓》^{[5]904},意为上有所行,则天下之人皆如之,上之化下,不可不慎。高允直指文成帝及在上之大臣没有做出榜样,以至上行下效,旧习相沿,风俗未改,使先帝的文化礼俗改革诏书成为具文。谏言中还意引《诗经·大雅·思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5]1010}句。周文王以礼法待其妻以至宗族;对于要天下人做到的事情,先从自己和亲近者开始做起,再推及天下人,身修、家齐而后国治。高允希望文成帝及大臣作出榜样,以使先朝诏书旨意畅行无阻。

孝文帝改制后,儒家经典思想更成为北朝君臣律已修身标准。在讲求“修身”方面,对《诗经》、《论语》两部经典的引用较多,北朝君臣每引以自况或讽人,显示出他们对儒家修身思想的服膺和认同。孝文帝本人儒学造诣精深,能以经史为鉴戒。《魏书·郭祚传》:

高祖曾幸华林园,因观故景阳山。祚曰:“山以仁静,水以智流,愿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于前,朕何为袭之于后?”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非景行之谓?”^{[4]1422}

景阳山在华林园西北,为三国时魏明帝曹睿所构筑。魏明帝曾“大治洛阳宫”^[6],激起臣下群起反对。郭祚即景而有所思,有心告诫孝文帝以史为鉴,其言实出《论语·雍也》孔子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7]79},以山水喻仁智,希望孝文帝修身健心,仁智并行,但孝文帝对于经史典故脱口而出,主动表示要惩前之失,郭祚遂云“高山仰止”。

孝文帝临崩,本欲托孤于其弟彭城王元勰,元勰虑震主之声,主动避嫌,请孝文帝下诏允解朝职。但宣武帝继位后,仍以元勰为宰辅。北海王元详进谗言,元勰终被下诏解职归第。该诏书引用经典,对元勰的节操予以称赞:

乃诏曰:“王宿尚闲静,……今乃释位归第,丘园是营。高尚之节,确尔贞固;《贲》、《履》之操,邈焉难追。”^{[4]580}

所引为《周易》之《贲》、《履》二篇篇题,结合诏书内容,其要表达的分别是《贲》之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及《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之旨,前者意为设饰于丘园质素之所,则不靡费财物,束帛乃“戔戔”众多;^{[8]107}后者意为如能谦退幽居,则平易无险难,守正得吉。^{[8]64}宣武帝诏书以“《贲》、《履》之操”,表彰元勰冲挹谦退、归营丘园的品格,但本质上是因猜忌而剥夺其职权;成就其高尚之节,《贲》、《履》之操,是宣武帝从典籍中所找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当然《贲》、《履》之操为当时所崇尚毋庸置疑。

北周宗室宇文达砥砺名节、安贫乐道,按照儒家思想标准自励。

(代爨王宇文)达雅好节俭,食无兼膳,侍姬不过数人,皆衣绋衣。又不营资产,国无储积。左右尝以为言,达从容应之曰:“君子忧道不忧贫,何烦于此。”^{[9]205}

宇文达所引“君子忧道不忧贫”,语出《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7]216}意为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只忧道之不行,不考虑和担心自己的生活。抛开政治因素,作为皇室一员和鲜卑后裔,宇文达的言行切实地表达了自己履践儒家精神的意志,难能可贵。

北魏后期,鲜卑大臣引用儒家礼仪规范律已律人之例甚多。元顺当众谏责灵太后的穿着装扮不合于礼,有失其母仪天下之身份。《魏书·元顺传》:

灵太后颇事妆饰,数出游幸。顺面诤曰:“《礼》,妇人夫丧,自称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彩。陛下母临天下,年垂不惑,过甚修饰,何以示后世?”灵太后惭而不出。^{[4]482}

元顺所引之礼制规范见于《左传·成公九年》:“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杜预注:“妇人夫死,自称未亡人。”^{[4]737}灵太后虽贵为执权柄的太后,也不能不处于礼教的笼罩约束之下。

公而忘身、亲力亲为等为官品行,是儒家和北朝统治者都看重和提倡的。西魏大臣长孙俭因部下有罪,以自己负有责任,自杖三十,宇文泰致书劳勉。《周书·长孙俭传》:

太祖又与俭书曰:“近行路传公以部内县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肃群下。吾昔闻‘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盖谓忧公忘私,知无不为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罚己以训群僚者也。闻之嘉叹。”^{[9]428}

宇文泰所引出自《周易》蹇卦六二。蹇蹇，忠贞貌。意为王臣屡犯艰难，并非为自身私利。^{[8]166}长孙俭舍身自罚，群下震肃。宇文泰认为长孙俭达到了儒家“忧公忘私，知无不为”的境界，予以高度赞扬。

（二）齐家

为了协调家庭伦理关系和保障家族利益，促益国家治理，北朝君臣以儒家的孝悌、男尊女卑、克己复礼等思想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

孔子认为，孝悌是仁之本。北朝伦理观最突出的也是孝悌。北朝中后期以孝治国，统治者对孝悌的强调，北朝史传所在多有。孝文帝曾亲自主持典礼，尊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即是树立国家重孝的标志。尉元、游明根向孝文帝作礼仪性进言，对北魏朝廷标榜的儒家孝悌思想再予以强调。《魏书·尉元传》：

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则，人之所崇，莫重于孝顺。然五孝六顺，天下之所先，愿陛下重之，以化四方。……”高祖曰：“孝顺之道，天地之经，今承三老明言，铭之于怀。”明根言曰：“夫至孝通灵，至顺感幽，故《诗》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则孝顺之道，无所不格。愿陛下念之，以济黎庶。”^{[4]1115}

游明根所引“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语出《孝经·感应章》：“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11]52}今本《诗经》无此语，游明根所言出处或有误。另外张普惠上宣武帝疏中所引“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4]1737}应亦本于《孝经》。孝文帝回应尉元之语，乃意引自《孝经·三才》：“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11]19}

儒家的“克己复礼”也成为孝文帝对宗室的要求。《魏书·元嵩传》：

大司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游田。高祖闻而大怒，诏曰：“嵩不能克己复礼，企心典宪，大司马薨殂甫尔，便以鹰鹞自娱。有如父之痛，无犹子之情，捐心弃礼，何其太速！便可免官。”^{[4]486}

“克己复礼”语出《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7]157}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克己”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安定王元休是元嵩的叔父，元嵩在为其叔父服丧期间即田猎自娱，悖于典宪，违反礼义，因而违背了孝文帝以礼教化治天下的精神，受到了孝文帝免官的处罚。

孝文帝欲为皇室立一宗师，认为其弟元勰才德堪当其任，促其担此重任。元勰辞谢，孝文帝勉励其就任。《魏书·元勰传》：

及至豫州，高祖为家人书于勰曰：“教风密微，礼政严严，若不深心日劝，何以敬诸。每欲立一宗师，肃我元族。……宗制之重，舍汝谁寄。……吾朝闻夕逝，不为恨也。”勰翌日面陈曰：“奉诏令专主宗制，纠举非违。臣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臣处宗乏长幼之顺，接物无国士之礼，每因启请，已蒙哀借。不谓今诏，终不矜免。犹愿圣慈，赐垂黜遂。”高祖曰：“汝谐，往钦哉。”^{[4]574}

元勰引《论语·子路》中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7]173}之语，表明担心自己不足以为宗室树立良好榜样，孝文帝则引《尚书·益稷》“往钦哉”之语，勉慰其干好职事。《尚书·益稷》记录舜与皋陶唱和，舜拜受其歌，戒群臣敬其职事：“帝拜曰：‘俞，往钦哉！’”^{[12]130}孝文帝也曾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告诫即将任职一方的皇弟高阳王元雍：“为牧之道，亦难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便是难。”孝文帝君臣不仅在书面语中，而且在交谈中，随时随处化用经典，信手拈来，又极为熨帖，足见其儒学造诣之精深。

孝文帝还用儒家行为规范指导太子的日常生活。《魏书·废太子恂传》：

高祖泛舟天渊池，谓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须自放，不可终朝读书。我欲使恂旦出省经传，食后还内，晡时复出，日夕为罢。卿等以为何如？”光曰：“孔子称‘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传》曰：‘昼以访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学之日，不宜于正昼之时，舍书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体，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光言为然，乃不令恂昼入内。^{[4]589}

崔光所引出自《左传·昭公元年》：“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10]1162}崔光以此劝孝文帝要使太子白天专心读书，保持身体健康，孝文帝信从其言。

皇室“立子以嫡”，既是以儒家思想“齐家”，又是一种政治行为。如宇文泰立世子，即最终依据了“立子以嫡不以长”的儒家宗法观念。《周书·李远传》：

时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长，已有成德；孝闵处嫡，年尚幼冲。乃召群公谓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马有疑。”大司马即独孤信，明

帝敬后父也。众皆默，未有言者，远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长，礼经明义。略阳公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为嫌，请即斩信。”^{[9]421}

“立子以嫡不以长”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13]的缩略语，语出《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是对嫡长子继承制、子以母贵思想的概括。在众人碍于大司马独孤信在场，左右为难，无法开口的情况下，李远窥宇文泰之意，关键时刻引经据典，一锤定音，使独孤信只能就范。

（三）治国

北朝君臣在经济、用人、司法等各个方面对儒家经典的征引，是认同儒家治国思想的突出表现。

北朝君臣重视孔子藏富于民、民富国富的经济思想。《魏书·拓跋素传》：

高宗（文成帝）即位，务崇宽征，罢诸杂调。有司奏国用不足，固请复之。惟素曰：“臣闻：‘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帝善而从之。^{[4]375}

拓跋素所引，语出《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是孔子弟子有若答鲁哀公所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时的回答，^{[7]161}其观点乃是对孔子“政之急者，莫大于使民富且寿也”^[14]（《孔子家语·贤君》）思想的发挥。

北朝君臣多次引用儒家经典中阐述重视贤才思想的语篇。太武帝平定中原，征聘部分汉族士人进入政权，所发诏书，征引《诗》、《易》，即已颇具儒家思想文化色彩。《魏书·太武帝纪》：

壬申，诏曰：“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板筑，罔以加也。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儒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诗》不云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4]79}

诏书所引儒家典籍语句，前者出自《诗经·小雅·鹤鸣》^{[5]670}，喻贤士身虽隐而名犹著，卢玄等“隐迹衡门、不耀名誉”，却声闻朝廷，正合此喻。后者出自《周易》中孚卦九二^{[8]243}，本意为我有好爵佳酿，我们共享，引申为我有好职位，我们共同治理国家。两处引用恰当地表现出新兴的北魏政权对贤才的渴求。

哉看有关考课的制度安排方面的例子。孝文帝在对群臣的训诫中，曾引《尚书》、《周礼》、《诗经》，说明考课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其原则：

后高祖临朝堂，谓群臣曰：“两仪既辟，人生其间，故上天不言，树君以代。是以《书》称三考之绩，《礼》云考成之章。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与百辟，允厘庶务。然朕识乏知人，不能使朝绝素餐之饥，野无《考盘》之刺，夙宵寤寐，载怀怵惕。……”^{[4]547}

“《书》称三考之绩”，指《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12]82}“《礼》云考成之章”，指《周礼·地官·小司徒》：“岁终，则考其属官之治成而诛赏。”^[1]孝文帝引之，说明按一定期限考核官吏政绩，其制由来已久。“素餐之饥”是孝文帝意引《诗经·魏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5]369}，指出有在位贪鄙，无功受禄之徒，却使贤人不得进仕，因此要通过考课进升贤能，黜退不肖。“《考盘》之刺”是引《诗经·卫风·考盘》^{[5]220}，惧使贤者退而穷处，以考绩做到任用得人，避免政有所失，野有遗贤。

在北朝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中，多有引礼入律、援经决疑之例，说明儒家思想熔入了法律之中，并指导着司法实践，甚至具有超越具体条文的效力。太武帝时期即有援经决疑的情形。《魏书·太武帝纪》：“（太平真君六年）三月庚申，车驾还宫。诏诸有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4]98}

孝文帝时期实行宽猛相济，礼刑结合，“齐之以法，示之以礼”^{[4]2877}的方针，符合《左传》的相关思想。《魏书·元澄传》：

澄曰：“……愚谓子产以四海为家，宣文德以怀天下，但江外尚阻，车书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难以礼治。愚谓子产之法，犹应暂用，大同之后，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变，深善其对，笑曰：“非任城无以识变化之体。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4]463}

“子产之法”典出《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徵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子产）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10]1225~1229}二人争论的焦点是以礼治国还是依法治国。对于孝文帝所问郑子产与晋

叔向孰是孰非的问题,元澄以子产为是,认为“礼治”与“法治”的关系是“道”与“权”的关系,甚合孝文帝之心。

北魏中后期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儒家“明德慎罚”的思想和执法原则。《魏书·辛雄传》:

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经恩竞诉,枉直难明,遂奏曾染风闻者,不问曲直,推为狱成,悉不断理。诏令门下、尚书、廷尉议之。(辛)雄议曰:“《春秋》之义:不幸而失,宁僭不滥。僭则失罪人,滥乃害善人……”诏从雄议。^{[4]1692}

辛雄所引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声子)对曰:……归生闻之:‘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10]1043}即宁可僭赏,不能滥刑。表示惧怕失去善人、恤民畏刑之意。

再如一些执法细节上,北朝汉族士人引经据典,面折廷争,为皇帝所接受,推动了司法的点滴进步。

(北齐孝昭)帝斩人于前,问(王)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实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闻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殿廷非杀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当为王公改之。”^{[16]421}

王晞所引出自《礼记·王制》:“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3]359}

(四)平天下

北朝统治者也从儒家经典中寻找统一南北的思想理论依据。北魏中后期,实行德化与武力统一并重的方针。孝文帝南伐之隙,与臣下联句作歌,孝文帝歌曰“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4]1240}。所引“遵彼汝坟”,典出《诗经·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正义曰:作《汝坟》诗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念其君子,犹复劝勉之以正义,不可逃亡,为文王道德之化行也。^{[5]56}孝文帝引“遵彼汝坟”表达其德化大行,道风远播,因此一定能够一举平定江南,实现一统之意。

为实现南北统一,邢峦从儒家典籍中寻找武力统一的依据,给北魏宣武帝上表称:“臣闻乘机而动,武之善经;攻昧侮亡,《春秋》明义。未有舍干戚而康时,不征伐而混一。”^{[4]1440}又如为统一北方,北周韦孝宽上疏陈策,其中引《左传》为据。《周书·韦孝宽传》:

建德之后,武帝志在平齐。孝宽乃上疏陈三策。其第一策曰:

臣在边积年,颇见间隙,不因际会,难以成功。是以往岁出军,徒有劳费,功绩不立,由失机会。何者?长淮之南,旧为沃土,陈氏以破亡余烬,犹能一举平之。齐人历年赴救,丧败而反,内离外叛,计尽力穷。传不云乎:“雠有衅焉,不可失也。”^{[9]540}

《左传·桓公八年》:“雠有衅,不可失也。”杜预注:“衅,瑕隙也。无德者宠,国之衅也。”^{[10]188}韦孝宽以自己在边多年的观察,看出北齐宵小受宠,内部矛盾交织,有机可乘,遂以武力平定为上策。

二、北朝君臣经典征引与

儒家文化认同进程之曲折

拓跋鲜卑统治者对儒家经典真正接受和用来指导实践有一个过程,其间经历了艰难曲折。

《魏书·崔暹传》载:道武帝拓跋珪攻中山,军中乏粮,崔暹献策曰:“取榘可以助粮。故飞鸢食榘而改音,《诗》称其事。”道武帝以为其有讥刺拓跋鲜卑之意,“衔其侮慢”,后借故将其诛杀。^{[4]758}崔暹可能只是想借机卖弄一下才学或者使自己的建议更有说服力而已,却不想犯了大忌。这一时期的拓跋鲜卑统治者在心理上既自大又自卑,导致了汉族士人“祸从口出”的惨剧发生。这种以征引为影射的事例,简直是文字狱的雏形,表明民族隔阂之深和儒家文化认同绝非一帆风顺。

北魏明元帝欲乘刘裕新死南伐,崔浩借《春秋》不伐丧之义阻止之,结果遭到明元帝斥责。^{[4]814}但明元帝已经是一个“礼爱儒生,好览史传”^{[4]64},儒学修养颇深之主;太武帝虽以雄武见称,但也崇尚儒学,如于始光三年二月,起太学于曲阜城东,祀孔子,以颜子配享。^{[4]71}

太武帝对儒家经典的接受和征引更近一步。上文已叙及太武帝所发诏书中征引《诗》、《易》,以及下诏以经义量决疑狱。而史籍中也有太武帝本人征引《诗经》以显其才学的记载。《魏书·穆顗传》载,太武帝对于穆顗的勇猛,叹曰:“《诗》所谓‘有力如虎’,顗乃过之。”^{[4]675}这里虽不能排除史官对太武帝雅化美化的嫌疑,但在当时已经大为改善的文化环境下,太武帝对儒家经典偶一引用,亦在情理之中。

从时间上看,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因为朝廷大力推行文治德化、移风易俗,引用儒家经典这种政治文化现象出现了一个高峰;北朝诸帝之中,也以孝文帝引用为最多,这与孝文帝以儒家思想治国及其个人文化修养水平颇高有关。孝文帝对经典之

语句常常信手拈来,是其酷爱学习经典的结果。元澄曾追述孝文帝“未常不以《书典》在怀,《礼经》为事,周旋之则,不辍于时”^{[4]471}。崔僧渊颂扬孝文帝“仁则无远不及,博则无典不究,殫三坟之微,尽九丘之极。至于文章错综,焕然蔚炳,犹夫子之墙矣”^{[4]631}。宣武帝时秘书丞孙惠蔚上言中盛赞孝文帝时期“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沦而复显,举二经于和中,一姬公于洛邑”^{[4]2759},所言不虚。

魏收在《魏书·宣武帝纪》中梳理了北魏诸帝的文治武功:“太祖龙飞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历,皆以四方未一,群雄竞起,故锐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显祖亦心存武烈,因循无改”,至孝文帝时,“稽参古式,宪章旧典,四海移风,要荒革俗”的条件方臻成熟,但仍因“戎辔兼兴,未遑儒教”^{[4]204},宣武帝时期又因“大兴板筑,续以水旱,戎马生郊,虽逮为山,还停一簣”^{[4]1471}。孝明帝时,主政的灵胡太后又崇信佛教,于提倡儒学着力较少。所以儒家思想文化虽然在洛阳上层落地生根,但在社会上蔚成风气尚需时日,六镇之乱又使这一进程有所影响。

不过,同为北朝后期的创业之主,宇文泰、高欢虽然自身文化有限,但都服膺经典。宇文泰使西魏朝廷文诰仿《尚书》、官制用《周礼》,对汉族士人引经据典提出的治国思想从善如流。刘国石先生认为,西魏北周改革是对孝文改制的纠正和补充;宇文泰任用苏绰制定了“六条诏书”,其中的“先治心、敦教化”之条的实施,使儒家思想的地位进一步提高。^[17]宇文泰的后继者都有较深的儒学修养,并以复兴儒家文化的政治使命为己任。而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相比,在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上其实并不逊色。从杜弼不小心犯了高欢家讳,情急之中引《礼》之“二名不偏讳”为据,高欢闻之对其释宥,足见高欢对经典的认同。^{[16]347}北齐公卿会议,常引典籍。^{[16]478}所以说北朝确立儒家思想文化认同的进程不但并未被六镇之乱真正打断,而且儒家思想的地位在北朝后期进一步提高。张荣明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思想不断衰落,儒家思想日益走强,国家逐渐强大并最终统一中国。^[18]此论确当。

当然,还要看到,北朝统治者通过多种方式宣示儒家思想文化的地位和重要性,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虽已恢复并逐步稳固,但并不意味着儒学全面复兴和整体上儒家的地位已经很高。在选官制度仍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的制度背景下,儒者单纯通过自身力学,被征聘进入执政队伍或者成为皇室师

傅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儒家思想虽然常常可以作为一种最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但并非无往不胜,北朝统治者对儒家思想并非一味地尊奉信守,大臣引经据典提出建议未必就会被采纳。有些统治者对经典的态度是取己所需,为己所用。而且一些儒家典籍的语句存在着不同解释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有时辩难双方都引经据典,却难分高下。如孝文帝与元澄就对“革”卦之吉凶有不同的理解,^{[4]464}还有孝文帝与高间各自引经据典,就江南是否属于中国、是否要武力统一有过辩论。^{[4]1208}

北朝君臣对儒家经典的征引是北朝儒家文化认同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纵观北朝君臣经典征引的进程,可以看出,北朝君臣对儒家典籍的引用日益增多,涉及方方面面,这种信服和遵从是逐渐普遍化、广泛化的。无论是拓跋鲜卑统治者,还是贵族,遇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从儒家典籍中寻找理论依据从零星到普遍,逐渐成为了一种习惯,一些皇帝或拓跋鲜卑贵族甚而做到了对儒家经典语句信手拈来,恰当熨帖地阐释佐证自己的观点。可见他们已逐步将儒家文化内化为自身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修养,将“圣人之言”作为思想源泉和理论指南。总体上,儒家思想在北朝的主导地位得到建立并趋于巩固,北朝历史呈现出一种儒家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和儒家文化认同趋于完成的态势。

[参 考 文 献]

- [1] 闫春新,庄亦乐. 魏晋南北朝政坛中的《论语》征引[M]. 济宁学院学报, 2011(1).
- [2] 张金龙. 儒家经典:北魏孝文帝思想的理论源泉[J]. 东岳论丛, 2011(1).
- [3] 李学勤. 礼记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4]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 [5] 李学勤. 毛诗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6] 《三国志·魏书》卷三《明帝纪》[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104.
- [7] 李学勤. 论语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8] 李学勤. 周易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9] 《周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1.
- [10] 李学勤. 春秋左传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1] 李学勤. 孝经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2] 李学勤. 尚书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3]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M]// 李学勤. 春秋公羊传注疏.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13.
- [14] 孔子家语·贤君[M]// 杨朝明, 宋立林. 孔子家语通

解.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157.

历史任务[J]. 民族研究, 1999(3).

[15] 周礼·地官·小司徒[M]//李学勤. 周礼注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85.

[18] 张荣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格局和发展趋势[J]. 史学月刊, 2010, (10).

[16] 《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责任编辑: 谢光前)

[17] 刘国石. 简论西魏北周改革——兼论孝文改制未尽之

Self-cultivation, Family Management, State Governance and World Harmonization: Classic Citation of the Rulers and his Subjects and Identity Process of Confucianism Culture

DUAN Rui-chao

(Library,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fucian culture identity was the core of that in Northern Dynasties. The ruler and his subject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had learned and accepted the Confucian culture and fused the Confucianism thought into their own ideologies and cultural cultivation, and considered Confucius's words as the theory guide to practise Self-cultivation, Family Management, State Governance as well as World Harmonization. Citing and applying the sentence and thoughts from Confucianism in their rescript, government discuss and written statement were the centralized reflection. Although the process was hard and tortuous, the trend of citing classic Confucianism thought from sporadic to universalization, indicating the Confucianism thought has generally firmed the position as the core ruling thought of Northern Dynasti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tended to be achieved.

Key words: Northern Dynasties; Confucianism Culture Identity; Classical Confucianism Citing; Self-cultivation; Family Management; State Governance and World Harmonization